■ 政德镜鉴㉑

他离任时，百姓欢送。沿街摆了许多桌子，上面摆放着清水一碗、镜子一面，有的则放一块豆腐、几棵青葱、三杯白酒。

颂扬他为官清似水，明似镜，公正廉明，一清二白。十里路，足足走了八个小时。

范筑先：沂河两岸 县长模范

□ 本报记者 卢昱
本报通讯员 颜超 臧德三

1938年11月15日，范筑先和日寇血战，在聊城壮烈殉国。此消息传到临沂，临沂人民缅怀旧恩，遥祭追思。

丰碑乃民心所铸。时至今日，缓缓南流的沂河水，仍用粼粼波光讲述着这位“范县长”的光辉岁月。在当年临沂县所辖区域里，不论乡镇还是村落，依然有人追忆着这位模范县长“范大老爷”的赤子之心……

玩忽职守也是杀人

范筑先来临沂当县长前，已从冯玉祥部第十三军少将参赞，转任韩复榘的第三路军少将参议，兼任沂水县县长。虽长期在军界任职，但他一直保持着正直清明、爱国爱民的品质。

范筑先到临沂来，实属突发事件。一条1933年11月10日的《大公报》消息，可以解释原委。这条标题《韩视察临沂，积案太多，县长撤职》的消息如是说：“（韩复榘）自九日晨七时半，开始问案，约百余起。午刻集合李占标旅长训话。下午一时，继续问案百数十起。因人民冤案多未决，甚怒。有第六区焦庄吉周两大户械斗，吉将周家杀十六口，经久未判决，将县长李凤五撤职，由范筑先暂代。已获凶手五人枪决，并将第六区区长张肇家撤职，押县府，限一月将凶手带齐。又查得司法警传票向人索钱，各责一百棍。”

短短的几句话，勾勒出临沂当时的政治生态。范筑先的前任县长李凤五，昏庸无能，贪污腐化。公堂之上无是非，衙门犯法无人问。属员佐吏，三班六房，争相敛财，公然成风。

紧接着，51岁的范筑先顺沂河南下，进临沂接替县长之职。此时，他已做足功课。“临沂古称琅琊，历代州郡都邑所在，地域辽阔，山河错综、钟灵毓秀，代产伟人，余心向往者久矣。”在《续修临沂县志》的序言中，他如是表露心迹。“下车后，即阅览旧志，以资参考。”

“范筑先一到临沂，就从地方志入手，了解历史。”临沂历史文化研究专家唐士文先生介绍道，“因在军中练就骑马，不会骑车，为便于走访，范筑先不顾年龄，弃马学骑自行车，严格要求自己。”

范筑先走马上任以后，率先整顿吏治，要求驻城的各机关每天早上5点半，到县府跑操打拳，然后开朝会训话。当年临沂县府在今考棚街中段，八十多年过去了，来来往往的车流将范筑先朝会时的演讲淹没在时空中。

朝会时，范筑先总是第一个到，对迟到和无故未到者，绝不放过。一次，建设科长没到，他骑自行车登门训斥：“大家锻炼身体，你睡大觉，算什么科长，怎么领导百姓建设？”罚此人补课，叫他一人跑步、打拳，众人围观。从此，诸科长唯恐迟到受罚，皆用闹钟定时。

除此以外，范筑先告诫官员，要廉洁奉公，不得行贿受贿、敲诈民财。尤其是对管钱管物的机构，管理更为严格。1935年夏，鲁西一带大雨滂沱，黄河暴涨，决口成灾，沿堤数县一片汪洋，百万人民流离失所。8月，范筑先在临沂城设“救济黄河水灾募捐委员会”。

1935年8月16日，由鲁西运来难民四千多人，除三百多人被安置在临沂城西的天齐庙外，其余灾民皆由范筑先亲自分派到各区设立的难民收容所。他还亲赴各收容所察看慰问，在衣、食、住各方面均作了妥善安排。8月31日，他又派红十字会会员伍献之、胡次章等，携带急救药品，分赴各个灾民收容所检查灾民，医治病伤。

因募捐委员会是临时设立，无固定数额，容易贪污。为防属员趁机捞取，贪污中饱，1935年9月，范筑先不打招呼，亲自到募捐委员会清查账目。他一进门就责问会计：“赈项是否有讹？”会计回答：“未有大错。”

对此，范筑先不放心，责令募捐委员会常务委员李新霆负责，召集全体委员清查账目，并限期三天。范筑先为彻底搞清问题，第二天早晨八点，又赶到募捐委员会办公室，亲自查核，一笔不漏，遇到疑点，穷追到底。

全部清查以后，虽无大错，但有的手续欠妥，范筑先严肃地说：“赈济灾民之款是救命款，贪污此项就是杀人，玩忽职守也是杀人，要罪上加罪，切不可掉以轻心。”

由于范筑先督察得紧严，募捐委员会没有贪污，也没有挪用款项。是年初冬，募捐委员会给灾民赶制了棉衣，年底灾民返回故乡时，都穿上了棉袄棉裤。这项救灾事宜，范筑先考虑周到、完备，不仅深得四千多灾民感激，连临沂县的百姓也齐口称赞这位好县长。

当时，临沂县征收处主任张汉九因吸大烟，贪污500多元公款，范筑先了解情况后责令其变卖家产，还上债务。即便这位姓张的主任磕头哀求，也免不了进大牢。直到范筑先离任后，张才获释出狱。这件事引起政府人员的极大震撼，大家引以为戒。十多年后，这位主任当了教师，事后每次聊起范筑先，不但不恨范筑先，反而佩服得五体投地，多是感激之情。

此外，政务警察每次到乡下出差，巧借各种名义敲诈吃喝，这成了当时心照不宣的惯例。范筑先却要求官员不准向老百姓索要财物，如有违反，先打板子再开除。

以身作则，吏治渐好

自1933年10月至1936年7月，范筑先在临沂任职不满三年，从不任人唯亲。他的亲朋、熟人、乡里前来投他谋事的很多，但对他们只是管吃管住管路费，至于对其谋差做事的要求，都是晓之以理，婉言拒绝。县府部员，他的随从，均是本着唯贤是用的原则，从政警中遴选。这种做法，在当时官场中，实属罕见。因此，他博得广大民众称道。这些人，后来跟随他到聊城，大部分牺牲在抗日的战场上。

续修临沂县志同仁合影，前排中立者为范筑先

在临沂县府中，范筑先如军中所遵，对下属一律平等，从不无缘无故地训斥部下。即使对待上级特派人员，他也是平等相待，既不行贿拉拢，也不阿谀奉承，公务公办，政事正做。在生活安排上，也只是待以清茶，请以便饭，有时派勤务到饭店要一碗馄饨，两个馍馍，至多吃顿大包子；不备烟，不置酒，更不设宴。来人为之不快，他却处之泰然。

“范筑先本人生活更是质朴、节俭，常年是布袜便鞋，清茶淡饭，从不特殊。”唐士文介绍。每当属下劝范筑先要注意身体，适当改善生活时，他总是以岳飞做楷模：“岳元帅是抗金名将，肩负大任，出力过重，尚且每顿饭豆腐白菜，轻易不动荤腥，我为小小地方官，为民谋利不多，怎能生活过高？”即使下去督察，也从俭从省，一如既往。

以身作则，吏治渐好。而社会上的大烟鬼、赌徒招摇过市，聚众赌博，明妓暗娼，乌烟瘴气，小脚女人、长辫男人等不文明因子，需要快刀斩除。

对于吸食鸦片者，范筑先采用“德威并用，先教后惩”的原则。用开会、讲演、文艺宣传等方式，陈明利害。如他令人编唱《戒烟歌》：“吸大烟一等好，爹不打，娘不吵，孝顺吗？不！——气死了”“吸大烟二等好，不纳粮，不纳草，抗官吗？不！——卖没了”“吸大烟三等好，举重的（临沂方言，意为处理丧事之人）喜欢，狼，仙体吗？不！——皮肉干枯瘦没了”。

教育不是万能的，对于屡教不改者，只能强制戒烟。同时，范筑先令人张贴布告，规定查获的烟具、烟膏，一律没收；对于贩卖毒品者，一经查获，处以极刑。当时，临沂城有个绰号“椒子鸡”的暗娼，因贩白面儿（海洛因），被处死。吸毒贩毒者，一时闻风丧胆。

为根绝鸦片来源，范筑先接任后第一个春天，就亲自带人到各乡检查，将所罚没烟苗，一律铲除。临沂与费县边沿区种烟很多，他照会费县县长，会同处理，以绝烟源，其他各县亦然。

范筑先还明令各区一切赌场一律取缔，麻将、牌九、宝盒等各种形式的赌博一律禁止，如果发现，将根据情节处罚。对于赌场中卖花生、香烟、烧饼、油条等小商贩们和旁观者们，因其耽误生产并助长赌博风气，也是加倍处罚，预防传染。

修志，似缓而实急

“范筑先常说，教育乃万事之基。他认为，要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，必须发展教育，提高国民素质。”唐士文解释说。

有一次，范筑先到城西走访当时的模范小学——古城小学，详细询问经费来源与开支、师生人数与成绩、课程设置与学校修建情况，连食堂、厕所都检查。谈了一晌话，临吃午饭时，他对学校的留饭请求，婉言谢绝。却和随员在返城时，路经城前大集，在一个小饭摊，买了一个锅饼、一斤豆腐，浇上红辣椒，美美地吃一餐。这件事很快在广大民众中传为美谈。

范筑先的教育观，立足实用，面向民众。在努力办好中小学的同时，他先后令人办起“师范讲习所”“职工学校”“民众夜校”“露天学校”等，采取“小先生”“半日班”等形式，吸收不同阶层的百姓学习文化。

范筑先对文化事业非常重视，成立“进德会”，设大礼堂、阅览室、球场，以及饲有山鸡、水雁、猴子等等的小动物园，供人们参加文娱活动；设立“民众教育馆”，编写接地气的宣传材料；举办“书词训练班”，以艺术的形式宣传政策、道德文明；举办“国术馆”“壮丁训练”，以锻炼百姓体质，灌输军事知识。

更重要的是，范筑先在干戈纷扰之时，不忘“似缓而实急”之大事，主张成立“文献委员会”，开设“县志局”。1916年，临沂县纂成第一部方志。范筑先认为，如不抓紧续修，“恐事迹湮没，难资观感”。

范筑先决定拿出1996块银元作为修志的启动资金，并亲任总纂，聘请名师宿儒。这些人在半年时间内，走访临沂县的山水人物，将疆域地图、历史沿革、历史大事、山脉水系、地质物产、气候雨量、职官宦迹、党务、政务、财政、教育、实业、交通、防务、司法、户口、宗教、礼俗、人物、文献、艺文等各方面资料，汇为一编，编纂《续修临沂县志》，给临沂留下了极其珍贵的文化历史遗产。

晚清翰林院编修、编修《重修莒志》的庄陔兰评价道：“见其部次秩然，其实厘然，无讳饰、无疏漏。”“是国史资也！岂徒备一邑文献哉？！”

当以清名流传后世

当时，临沂县下辖今兰山区、河东区、罗庄区以及兰陵县等地。境内土匪多如牛毛，民间有“神山到磨山，毛贼有万千”的歌谣。小股土匪数十人，大股的能达到几百人，打家劫舍，拦路绑架，民不聊生。

1935年，巨匪刘黑七部3000多人，窜到临沂、费县一带，当地的土匪更是趁机蠢动。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派遣三个师驻守临沂，准备剿匪。一时，临沂城乡大军云集。驻扎在临沂城里的师部、旅部、团部，堪比土匪，均派副官到县府索要供应，米面鱼肉，草料席苫，无所不要。他们妄图借剿匪之名，强行大量勒索。

出身行伍的范筑先深知，这帮人有权有势，根基深厚，若满足他们的要求，可以结交不少军界要人，为晋升留出路；若断然拒绝他们，这帮人都是有枪有炮的“恶狗”，有的敢拿皮带抽打县长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为此，一种念头在他脑海中越发清晰：“我军旅生涯几十年，给老百姓做了哪些善事？若满足这帮人的贪欲，把人民置于水火，对不住临沂百姓。人生天地之间，当以清名流传后世，不能为一己之私落千载骂名。”

于是，范筑先决计舍身护民，铤而走险。翌日，范筑先把副官们请到大堂，他自己身穿少将军服，手持马鞭，威风凛凛地站在大堂之上，神态严肃，声音高昂，说道：“诸位，剿匪除患，利国利民，此乃军人天职：若此，则国家有幸，民众喜悦。而当前军捷未报，匪患未除，却额外索取，则于国无补，于民无利，于理也不顺。临沂系偏远地带，贫困地方，百姓没钱，县府没钱，我县长也没钱。诸位所要草苫、芦席、开水，我范某人保证供应，其余所求，一概无力照办。倘若诸位仍无理纠缠，我范某当以第三路军军法处长之名义，予以惩处（范筑先当时是第三路军总指挥部军法处长兼临沂县长）。那时，休怨我不讲情谊！”

听完这番话，众副官的威风为之一扫，无声无息地狼狈遁去。范筑先这一段直理陈辞，使临沂县人民免除了一场兵燹之灾，全县的官吏百姓，对范筑先的过人胆识，无不拜服称颂。

理顺内部关节后，对外剿匪，范筑先不遗余力。据《续修临沂县志》载，他“电告省府，调大军进剿，并修苗庄飞机场，调空军助剿。终于将刘匪驱逐出境……先后擒斩匪首数十人。同时，令各区乡举办里联庄会，训练壮丁，武装群众，为正本清源之计，以杜匪患”。

在这期间，范筑先经常到各区乡视察训练情况，布置防匪措施，大刀阔斧，雷厉风行，临沂全境，匪患遂除。“临沂城附近村民进城卖粮的老百姓，如当天卖不完，放在皇姑桥下。等五天后，再次逢集时取出，绝不丢失。真是路不拾遗啊！”世居临沂城的沂蒙文史研究者李勇介绍说。

民心潮起改革处

土匪生乱，苦了百姓，而政府不作为，更伤民心。范筑先一到临沂，就接到不少因土地捐税不平而争讼的状纸。经过仔细查对，他发现临沂县“粮户失真，地亩失实，科财失平”的现象严重。

为解决这种弊端，范筑先到任不久，便提出土地陈报和黑地缴价升科主张，在县府设立专门机构，并派人员赴各乡督办。各村设土地陈报组，负责丈量土地事宜。统一准绳、实地丈量，四至分明，准确无误，填写三联单，户、乡、县各存一份，可随时查对，杜绝舞弊。

范筑先知道当时乡政权多为乡绅掌控，可能弄虚作假，或拖延时间，最后一拖了之。于是他亲临督办，善始善终。“这次土地陈报，查出黑地361亩多，计缴地价757元，解决了地亩失实、粮户负担不合理的弊端，受到百姓点赞。”李勇说。

土地查清后，范筑先又发觉田赋征收办法不利于农民，力主改革。原来田赋征收仍沿袭历代办法，不论远近，一律到县城交纳。临沂县境辽阔，偏远区乡，距县城有百里之多。农民每年春秋两次进城纳税，往返几天，饱受辛苦，而且食宿花费，往往超过田赋数额。如果逾期交纳不上，县府必派员上门催讨，饮食招待等费用，农民损耗更大。

“范筑先在视察中发现这些情况，深感老办法弊病不少，便决定变革新法：在全县内按路程远近，分设征收柜四个，每两区一个。到收交季，县府派员分头前往分柜征收。征前，由征收处填好通知单，先行分发到户，农民持通知单，按次序前往征收柜交纳。这样农民避免了辛苦，减轻了负担，也不再遭受官府吏员的勒索。这项改革，使得民心澎湃。”李勇说。

除了财政，司法也是县长之责。对于诉讼案件，范筑先特别认真、谨慎，他不主张打官司，主张调解；更不主张属员借民事纠纷，勒索民财。他对民众讲“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”，不要动不动就打官司。如果真有冤情，就随便找个识字的人写张状子，不用专门花钱请讼师。

范筑先对诉讼案件，十分认真，非常公正。每断一案，总是亲自看诉状，并且多次调查核实：然后，再开堂公审，邀请民众中经事多的长者参加，并欢迎民众参观。这在临沂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。

一次第四区鹤埠乡的王作甫与其外甥刘某，为争当本乡乡长，起诉到县。王作甫出首外甥贩卖大烟，有警士班长王兴盛作证，并呈上刘某贩卖的大烟作为赃物。人证物证俱在，并有首告一口咬死，看来刘某犯罪属实。

可是审讯刘某，刘某却一字不吐，也不画供。面对范筑先再三追问，只回答说：“栽赃陷害。”别的什么话也不说。提审警兵，问搜查毒品过程，警兵说在刘某褥子底下一搜即搜出了，轻而易举。

范筑先生疑，征询旁观民众意见，有的提出：“范县长明令规定，贩卖毒品者处以极刑，怎么刘某会傻到把毒品放在褥子底下，不藏严实？”范筑先认为此话有理，便带领一干人众到刘某家里亲自探查现场。

回县后，范筑先追问警兵道：“贩毒会被处死，毒品何以放在表面？你又怎么会在那里一搜即行搜出？”警兵惊慌，说不出话。范筑先见状，即下令责打警兵一百军棍，警兵受刑不过，从实供出：事先警士班长王兴盛令他带着大烟藏匿在刘某褥子下面的，所以搜时，轻易发现。案情查实后，将王兴盛处以极刑，王作甫判罚劳役，刘某释放，警兵开革。

还有一次，范筑先审“响马”（指拦路抢劫商旅的强盗，因抢劫时放响箭得名）案时，围观的人很多。而带上来的“响马”，却是一位叫凌作善的十几岁娃娃。原来，他的父亲犯了“响马”案，他提着匣枪投案，要求替父受死。范筑先不但没加罪于他，反称赞他孝顺勇敢，让他回家劝说其父改邪归正。“小响马”泣不成声，匍匐在地，他要求牵马坠蹬，报答再生之恩，范筑先把他留下当了通信员。

人必须有傲骨

除了骑着自行车到乡下调查民情，范筑先在思考中，也使临沂城添加了几分灵动。

临沂城有着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，名胜古迹颇多，如琅琊冢、普照寺、王羲之洗砚池等，为人们津津乐道。可范筑先却没有闲情逸致游览这些名胜。他巡察全县各处，把注意力放在与老百姓相关的地方，关注的是民众的疾苦。

1934年，国民党驻临沂的六十六旅旅长李占标，借考古之名，公然派兵挖掘“琅琊冢”，妄行发财之实。他先进行了打探，然后突然戒严，派工兵挖墓。在墓南开挖墓道，两天后挖到墓门，发现石门被打碎，而且墓中充满了淤土。富有经验的几个士兵告诉李占标：“此墓早年被盗过，宝物已空，且是‘土洞子’，无法再挖了。”李占标只好作罢。

此后，范筑先巡察到这里，见地面广阔，便于建筑公园，供民众休息游览，就在冢顶盖了一个六角小亭，上悬“琅琊亭”。亭内设石桌、石凳，供游人小憩，亭的四周广种鲜花芳草。范筑先把这里定名为“琅琊公园”，是临沂城第一座公园。

“琅琊公园虽然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被毁，建成酒厂，但成为了一代人的记忆。”李勇介绍，公园东濒沂河，北靠涑、祊二河，南接东姜园菜地，西临东城门楼。登亭远眺，远山近景，临沂古城，尽收眼底。

1935年春，范筑先曾饶有兴致地登上琅琊亭，看农民春耕，俯瞰临沂城全貌。当他的目光落在两处外国人开设的诊所时，面容严肃，长须抖动，疾步返回县府。他早就体会到，洋人为临沂城的富人服务，穷人却看不起病，这是不幸，更是耻辱。于是，他着手筹建西医医院，以挫洋人嚣张之气，解除民众的痛苦。

是年冬，适有临沂县城人郑信之，刚由省立医学专科学校毕业返回故乡。范筑先听说，立即邀请他到县府，和他商谈筹建县立医院事宜，郑信之慨然答应，愿竭力协助。当时二人商定好，医院定名为“临沂县立医院”，院址设在考棚街西街的药王庙，把破旧房子修整一新，再按需要添置设备。

1936年春，医院开始营业。医院虽然初建，设备简陋，药品不足，医师不全，但服务态度好，药费低廉，对民众很方便。而更主要的是，这所医院是中国人在自家土地上办起来的医院。“范筑先常说，人不能有傲气，但必须有傲骨。这所医院的建成，挫败了洋人的嚣张气焰，摆脱了洋人的奚落。”李勇介绍说。

当时，历来官府很少整饬市容，给群众造成诸多不便。纵贯临沂城的中心街——沂州路南段是全城最繁华之处，商店铺户等买卖大多集中在这里。每天车水马龙，街道本来就窄，商户们为了遮蔽商品受日光曝晒，装饰门面，招徕顾客，各自在铺门前加盖一条长厦式的棚子。这样，街道显得更加狭窄，人流车辆更加拥塞。而且南门“望淮门”在第一道门和第二道门之间，还加建了瓮门，出进城门，迂回曲折，甚为不便。

针对这种情况，范筑先决定将瓮门和商店前棚子一律拆除，并亲临现场监工。街道展宽以后，由于年久失修，路面凹凸不平，车辙深达一寸，行走不便。范筑先又下令整修了两条街道：一是拨款把南大街修成石板路，二是用罚土豪狄拔贡的五百银元，将八小集修成了石头路。这样一来，临沂市容大大改观，交通大大改善，民众无不称颂。

余荫蔓延一甲子

临沂城东临沂河，另有涑、祊两河流经，建筑桥梁至关重要。东门外，原有沂河桥一座，系木板搭建，桥面狭窄腐烂，摇摇欲坠，行人通行提心吊胆。1934年修建台潍公路时，范筑先建议改建石桥，宽一丈，长四里半，工程颇大，除拨款项外，他在临沂又募捐自筹三万元。

“当时没有机械，全靠人工喊着号子。一天一个工3毛5分钱，一天就能赚出一二十斤面，在一块钱就能称48斤面的那个年代，这样的待遇非常有吸引力。”李勇分析说，大桥主桥桥面用钢筋混凝土修建，漫水路用料石铺设，这是沂河上第一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公路大桥。当时许多人误以为此桥是外资建设，因此称之为“东洋桥”。

范筑先亲自监督，十个月后大桥竣工。由于设计出了毛病，桥无活板，河道不能通行舟船。本来沂河可以行驶小型帆船，北上沂水，南下江淮。这一改建石桥，帆船不通，百姓有意见。范筑先立即责令工匠人等将桥加以改造，除去桥面一孔，安置活动钢板，这样使得人行船驶两相方便。

“范筑先悉心呵护建设临沂古城，而且余荫蔓延一甲子。他建造的东洋桥一直使用到1994年。”李勇说，“范筑先还重修了北门外祊河上通仙桥，以及西门外的广济桥一座，百姓大为便利。”

在今王羲之故居斜对过的天主教堂北边，有一条不起眼的小巷，南北走向，南头东折接营坊巷，北头也是东折接营坊巷，全长120余米，宽约3米。如果不是巷子里的老人介绍，很难让人想到这条再普通不过的巷子竟然也与范筑先有联系。

最初，商家巷一带并没有街巷民宅，而是一片大汪。清朝时，住在马石猴巷的商姓人家，偶然发现西北洼子一带因地势低洼，硝土储量丰富，便买下了汪东边的一块向阳地，把家搬迁到这里定居，专门从事制碱生意。后来陆续有人来此居住，逐渐成为巷子。为纪念商姓创始之功，便取名“商家巷”，现在商姓后代子孙仍有人住在这里。

商家依靠诚实经营，卖柴碱发家致富，家境变得殷实富足，同时注重以孝治家。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，范筑先任临沂县长时，商家的老父亲病故，儿子要为父亲出大殡，灵前要题写铭旗。因商家无功名，故举人秀才都不给题写。

消息传到范筑先这里，他正愁着修“老明堂”（盲人和孤寡老人养济所）缺少资金，马上让人通知商家，他要亲笔题写，但要收200元的润笔费，商家得知阖家高兴。立即派人送去大洋，范县长给题写了“孝行可嘉”四个大字。商家视为最大的荣耀，修建“老明堂”的资金也得到解决，而范筑先卖字也传为美谈。

“1936年7月12日，范筑先调离临沂时，老百姓从十里八乡赶来，夹道相送。沿街摆了许多桌子，上面摆放着清水一碗、镜子一面，有的则放一块豆腐、几棵青葱、三杯白酒。颂扬他为官清似水，明似镜，公正廉明，一清二白。有的桌上摆几盘糕点，以示郑重。”李勇介绍，上午8点，范筑先在士绅名流陪同下，从县府出发，他每走几步，就对相送人群拱手致谢。

历史的长镜头扫过那一天的临沂城，淳朴的临沂人舍不得爱民的好官。“就这样走走停停，范筑先路经考棚街，茶棚街（今天的沂蒙路），再经北大街、南大街，出南门转东，直到沂河西桥头汽车站，正好十里。这十里路，足足走了八个小时，直到下午4点，才抵达汽车站。”李勇说。

沂河东洋桥